

我们的历史

——巴尔特书写的中国

车槿山

巴尔特的全部著作中,1970年发表的讲述日本文化的《符号帝国》是最经常被人提到的书之一,并且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赞扬。例如,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的雅克·兰就说过:“我不知道他的书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不知道他与那个国家的关系是幻觉的、想象的,还是现实的,但我非常喜欢他对日本烹调、人群、东京的描绘。”^①

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把自己初次接触的古老而遥远的东方异质文明当成文本解读,展开了自由自在的片段式、发散式思考。他关注的不是日本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等,甚至不是文学艺术,而是生活艺术,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在他的笔下,日本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文明范式,一种符号系统,即符号帝国。巴尔特正是用这种文本解读的方式,以亦真亦幻的文学方式,讲述了一个哲学的日本,描绘了一个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写出了这部极具个性的著作,真正说出了人所未言的一些东西。

相比之下,尽管巴尔特在1974年也曾访问过中国,但似乎回去后没能

^①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就中国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们以前知道的也仅仅是一篇发表于《世界报》的应景文章——《中国怎么样》。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他在中国各处的参观,强调指出中国没有什么色彩,绿茶无味,景色平淡,生活平静,到处都是祥和的气氛:“民众来来往往,劳动,喝茶或独自做操,没有戏剧,没有噪声,没有矫揉造作,总之没有歇斯底里。”^②

这样的印象式描述,自然谈不到深刻,而且和当时法国内外的主流话语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至少从表面看不大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要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恰巧并不平静,并不祥和。

巴尔特当然知道中国正在批林批孔,他也谈到了中国的政治运动,说中国几乎只能读出政治文本,到处都是陈词滥调。然而他接下来的分析,却让人感到十分意外,政治运动在他的笔下失去了严肃而残酷的内涵:“这些表面看来严格编码的话语绝不排除发明,我几乎要说:这是某种游戏活动;以目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例,它在各处进行,有千万种形式,它的名称本身就像快乐的铃铛作响,运动分解为发明的游戏:一幅漫画、一首诗、一场儿童短剧,在这种演出中,一个化装的小女孩在两段芭蕾舞之间突然出来劈开林彪的模拟像。政治文本(独自)孕育了机遇剧的这些节目单。”^③

我们可想而知,几乎所有对巴尔特有所期待的人都对他的这篇文章感到失望:巴尔特作为当时最杰出的社会符号学家,曾在《神话》中出色地破译了传媒、广告、时装、饮食、搏击赛、脱衣舞等种种社会话语,曾在《符号帝国》中成功地解读了日本文化,但为什么遇到中国就不行了呢?

其实,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巴尔特在这篇文章里对自己的“问题系”有一个说明。在他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发问必然带来西方对自身的质疑,在难以发现中国文化的确切意义时尤其如此:“中国似乎在拒绝交付这种意义,这并不是因为

^② 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Seuil, 1995, p. 34.

^③ 同上。

它隐藏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更具颠覆性地拆解了概念、主题、名称的机制;它不分享我们的知识对象;语义场瓦解了;不合时宜地对意义提出的问题,反倒成为意义本身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反倒成为幻影。”^④显而易见,巴尔特在这里是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凸显中国的相对性,因此不能以西方的范式解答中国之谜,描绘中国形象,建构中国叙事,否则就有可能在思想上落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反过来说,也正是中国文化体现的差异性给他提供了审视自身文化的机遇,中国的“无意义”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深究的意义。

其次,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出版单行本时他又增补了几段内容,在反驳对自己的责难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谈到了言说中国的可能性问题,即他所说的“原则问题”：“不是允许说或不说什么,而是可能说或不说什么。”^⑤他认为,就像语言受到限定一样,话语也受限于文明和意识形态,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的许多发言,都是出于某种教条以肯定、否定或虚假自由的方式展开的对中国的想象。而他恰恰是想突破这种限定,生产一种既不肯定,亦不否定,甚至不是中性的话语,而是一种“无可奉告”式的话语,一种属于伦理学和美学而不属于理性和信仰的话语,让中国处于鲜艳的色彩、强烈的味道和生硬的意义之外,因为这样的色彩、味道和意义归根结底是与菲勒斯的炫耀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这里所说的“菲勒斯的炫耀”其实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巴尔特的一些补充性论述,尽管是事后对自己的一种辩护,但仍然表露了他面对中国这个他者时不愿意做出直接而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根本态度,以及他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对写作—阅读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或文化介入行为的思考,这和他一贯的思想也是吻合的。我们知道,此时的巴尔特早已从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在他的观念中,社会就像文学一样,不再是以线性历史为先设的、成等级制有序排列的、有固定结构和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体现无限差异的开放性文本。他在《S/Z》一书中曾对

^④ 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Seuil, 1995, p. 32.

^⑤ 同上书,第34页。

这样的文本做过形象的描述：“这个文本是一个能指的星云，而不是一个所指的结构；它没有起始，是可逆的；我们通过好几个入口进到其中，但任何一个入口都不能被确认为是主要入口；它调动的代码无止境地显现，不可确定（除了偶然情况，其中的意义从不接受一个判定原则）；各种意义系统有可能控制这个绝对多元的文本，但它们的数目没有穷尽，因为度量单位是语言的无限。”^⑥ 换句话说，巴尔特在《中国怎么样》这篇文章中的写作态度和他在《符号帝国》一书中的表现其实是一样的。他在此书开篇第一章《那里》中说：“写作总体而言是一种具有自身方式的顿悟：顿悟（禅宗事件）是一次或多或少有点强烈的地震，晃动知识和主体：它造成一种‘言语的空无’。正是这种言语的空无构成写作；禅宗的特点正是从这种空无出发，抛弃一切意义来书写花园、动作、房屋、树丛、面容、暴力。”^⑦

另外，去年，法国克里斯蒂安·布尔瓜出版社出版了巴爾特的《中国旅行笔记》，这本书还未收入全集，因而应该不大为人所知，但在法国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和争议。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怎么样》一文的展开，细读之下，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以上所谈的问题。

《中国旅行笔记》实际上是四册笔记的合集，前三册是巴尔特访华时的逐日记录，有时甚至是“逐时”的记录，第四册是他自己对前三册的内容所做的主题索引。

这次访华是受中国驻法国使馆邀请，与泰凯尔派成员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普雷奈、瓦尔一起来的，从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为时约三周，全程费用自己负担。来中国后，他们按照中国旅行社的安排，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洛阳、西安等城市停留，游览了故宫、中山陵、龙门石窟、大小雁塔、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天坛等名胜古迹，参观了人民公社、工厂、医院、小学、幼儿园、居民区、展览会、动物园，与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有过交流，晚上还观看了杂技演出、体操表演、女排比赛、电影《青松岭》、舞剧《白毛女》、京剧《杜鹃山》等。总之，这基本上

^⑥ Roland Barthes, *S/Z,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2, Seuil, 1995, pp. 558 - 559.

^⑦ Roland Barthes, *L'Empire des signes,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2, Seuil, 1995, p. 748.

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为外国人安排的典型的旅游线路和项目。

因此,巴尔特这次访华的经历看似丰富,其实十分有限,但他的笔记仍然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他自己列出的主题都有一百多个,其中除了“刘少奇”、“林彪”、“大字报”等当时不可避免的官方话题之外,出现最多的是“艺术”、“书法”、“修辞”、“色彩”、“气味”、“身体”、“服装”、“客厅”、“风景”等主题。这也就是说,他虽然身处当时那种疯狂的政治氛围,但有意保持了一种距离,关注的是事件的细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与物。全书行文也十分散漫,客观记录夹杂着思考和评论,零零碎碎,经常都不是完整的句子。当然,《中国旅行笔记》是巴尔特身后出版的遗作,是一本未完成的书,我们读到的是原初状态的手稿,但它仍然显露了巴尔特书写中国的构想。一百多个主题说到底也就是没主题,他避免的就是结构中国,避免赋予中国一个固定意义,他要把中国当成一个没有中心的文本解读,当成一个“无中之国”。

巴尔特在《中国怎么样》一文的结尾,提到法国著名史学家和散文家米什莱曾把梦想的法国比作一篇大散文。巴尔特借用米什莱的比喻,说中国也是“杰出的散文”^⑧,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首诗歌,不是一部小说,不是一出戏剧,总之,不是隐藏着大写的真理和终极的意义而有待破译的叙事。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尽管在中国看过戏剧,却说中国“没有戏剧”。《中国旅行笔记》则最典型地体现了巴尔特的这种散文想象,它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而其中再现的中国则成为一篇更大的散文。

由于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作为此书写作风格的例子和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历史事件的回顾,我们来占用一点篇幅,看看巴尔特对他们在北京大学的交流活动所做的记录和描述。这是《中国旅行笔记》中仅有的较为详尽的部分,长达十多页,而且也是最具批评意识的部分,此书其他地方尽管偶尔也有对中国的批评性思考和评论,但一般都较为温和,而且多是以幽默、委婉、模棱两可的方式提出的。

^⑧ Roland Barthes, *Alors, la Chine ?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Seuil, 1995, p. 34.

5月3日,也就是巴尔特离开中国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五人来到北京大学和师生座谈。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之行的重头戏,为此还特意要求增派翻译,最终每人都各配了一名译员。他们乘坐的面包车在校门口就像今天一样被门卫拦住,打了电话才得以放行,进入“精致而无人的校园”^⑨。接待他们的有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师生,还有革命委员会的干部。

首先是北大方面为他们介绍学校的历史和现状,内容涉及学科建制、师生概况、两条路线斗争、工农兵上大学、社会实践等,其中基本的观点是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相比过去,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文系学生现在可以创作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哲学系学生现在学习两个月就可以解释、批判《论语》,这就是教育革命取得的具体成果。然后这些泰凯尔派成员提出问题,北大教师做出回答,问答涉及学生生活、批林批孔运动、《哥达纲领批判》、对斯大林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语言问题等。

显然,这次座谈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的,这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是不可避免的普遍情况。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北大方面不论是在对学校的介绍中,还是在对问题的回答中,只会使用一套陈词滥调,建构一个走向光明的革命叙事。巴尔特对此做了认真而忠实的记录,同时也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失望和厌烦。我们从他的评注中摘录几条来看看他当场的实际感受:

“永远不能回答事实问题、历史问题,话语是普遍性的,某种畸形意愿的诉讼。”

“我们确实不是身处历史科学的大学,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拿出意愿的证据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我们总是提出材料的问题,但从未得到回答。”

“推理和论证的幻影,没有证据,返回到神话?返回到话语?”

“这所大学——文化革命的发源地,现在完全空荡,平静——而且讲

^⑨ Roland Barthes, *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 Christian Bourgois, 2009, p. 197.

着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乖巧的话语。”

“这是纯粹的教理世界。”

“这个可怜的人，幼稚的人，没有料到我们已经听过他的全部讲演了，已经有十次了。或者这对他而言毫无重要性？价值的改变：原创性不再是一个价值？重复不是一件坏事？”

“最奇怪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中国，而是激进程度的马克思主义。”

“这所大学超正统，超激进，超符合教理，确实是：先锋派——但不符合我们的词义！”

“绝对的政治集权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就个人而言，我不能生活在这种激进主义中，这种狂热的独白中，这种强迫性偏执狂的话语中/这种织物中，这种没有裂痕的文本中。”^⑩

座谈结束后，这些法国人回到饭店，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郁闷，全体聚在一起喝了一通茅台酒。

《中国旅行笔记》大约首先是有史料价值，毕竟文化大革命中来华的外国思想家不多，写下记录的就更少了，而来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并写下详细记录的就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了。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一向享有崇高的声誉，理所当然地受到无数人的赞美，像这样受到负面评判应该是极其罕见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应该忘记，也值得深思，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感兴趣的是，巴尔特在这里的种种异议具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以否定的方式清楚地再现了他的肯定和喜好。普遍性话语、畸形意愿、非历史科学的大学、没有材料、幻影式推理和论证、最乖巧的话语、纯粹的教理世界、没有原创性只会重复、激进程度的马克思主义、超正统、超激进、超符合教理、集权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狂热的独白、强迫性偏执狂，总之“没有裂痕的文本”，这一切在他看来全是套话、假话、神话，是屈服于意

^⑩ Roland Barthes, *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 Christian Bourgois, 2009, pp. 204 - 211.

意识形态的说教,不仅不是真实的中国,而且还掩盖了真实的中国,因而不足为信亦不足为训。换句话说,巴尔特认定的中国就是这里的否定之否定,所以他才会面对这样的疯狂却说中国“没有歇斯底里”。

如果我们把巴尔特有关北大的评论综合起来看,有趣的地方还在于,他反感、反对的一切,也许可以归结为北大违背了蔡元培提倡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①。这当然是巧合,也是我们阐释的结果,巴尔特不大可能知道蔡元培,更不大可能知道几成北大校训的这段名言,但这也恰恰说明中外思想家理想中的“世界各大学通例”其实是一样的,并且扩大而言,这种“通例”也恰恰是巴尔特书写中国时的原则和“主义”。

古往今来,多少外国人书写过中国!以至于中国学正在成为,甚至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仅就法国当代书写“红色中国”而言,人们经常提及的著名人物就有马尔罗、萨特、波伏娃、克里斯蒂娃等人,他们全都是驰名世界的思想家,但今天看来,他们那些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论断在相当程度上是成问题的,也部分地被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所证伪。巴尔特是左翼知识分子,从亲华—反华这种自启蒙运动就有的简单二项对立来看他是前者,但他却保持了一种清醒和谨慎,同时也就避免了以上这些人的境遇。

如果说历史有人在面对中国时和巴尔特很相似,那应该就是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了,巴尔特在《中国旅行笔记》中自己承认了这点。他说:“重读我的笔记来做索引,我发现,如果我就这样发表,这就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安东尼奥尼。”^② 我们知道,1972年,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中国》,而197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将这部影片定性为反华影片,全国性大批判随即展开,直到2004年底,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学术观摩展,《中国》才第一次

^①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蔡元培全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1页。

^② Roland Barthes, *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 Christian Bourgois, 2009, p. 215.

在中国境内解禁公映。在这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尽管也拍摄了一些著名景点,如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苏州园林、红旗渠,也记录了一些官方安排的参观,如小学课间活动、针刺麻醉剖腹产手术、纺织女工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讨论政治形势等,但他的重点放在偶然捕捉到的场景上,大量篇幅用于随意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许多特写镜头长久地停留在普通中国人的面孔上,展现各种表情,试图理解人物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是《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所说的:“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⑬这样的批判当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造成的冲突,但同时也隐约显露了中西纪录电影观念的差异。安东尼奥尼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他眼中的世界只可能是不完美的,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如此。他追求个性化体验的影像表达,必然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析,放弃道德说教的叙事,所以如果说中国对西方人是一个谜,那么他的影片恰恰忘记了给出谜底。这一切确实和巴尔特笔下的中国相像。安东尼奥尼和巴尔特相像的另一个地方是,这部影片在导演自己的国家也受到不少的责难。历史的阴错阳差,有时真让人既无奈,又感慨。

归根结底,巴尔特在书写中国时也是没有给出中国的谜底,即拒绝赋予中国的现实一种固定意义,不论是在《中国怎么样》一文中,还是在《中国旅行笔记》一书中,这都是他为自己划出的最基本的警戒线。老实说,他这里应该也有明哲保身的策略考虑。在当时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中,他不想得出意识形态的意义,否则,不论他是肯定还是否定还是折中,都将是尴尬的,不讨好的。但无论如何,他书写中国时的这种立场、态度和方式,不仅使他最终展现了一个有多种指向的、多元的中国,没有简化中国,而且使他从根本上避开了“以西格中”的陷阱,即欧洲中心论的陷阱,因为在他看来,就连追问意义本身都是西方思想的特质:“西方

^⑬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载《人民日报》1974年1月30日。

用意义湿润一切事物,如同一种专制的宗教把洗礼强加给全体民众。”^⑭

其实,欧洲中心论这一概念和思潮本身也是现代历史的建构,只能通过线性历史观得到虚假的证明。因此换一种说法和理论视野,我们也可以认为,巴尔特在这里拒绝的,其实就是利奥塔尔所说的在世界范围内已然崩溃的大叙事:“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⑮巴尔特的替代方案也正是通过描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建无数的小叙事:“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⑯,“如开放系统话语、局部性话语、反方法话语,以及我们在误构一词下汇集的一切。”^⑰这些小叙事只符合局部决定论,只具有临时契约性质和相对真理价值,但它们却更能经受历史的检验。

今天,离巴尔特访华并书写中国已经有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场记录不可避免地变成历史文献,东西方碰撞的空间问题也变成古今延续的时间问题,尤其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形态也已经面目全非。然而,不论是阅读巴尔特的《中国旅行笔记》,还是观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我们倾向于遗忘的中国人曾经的真实生活,带着震撼的力量扑面而来,唤起我们无尽的回忆和感动,就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那块著名的马德莱娜小蛋糕一样,复活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和历史。本雅明在评论普鲁斯特时把这种记忆或回忆称为“没有要点的故事”,并且说:“回忆中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不过是开启发生于此前此后的一切的一把钥匙。”^⑱这种“没有要点的故事”,个性化体验,最终指向集体记忆,指向青春,指向拯救。

^⑭ Roland Barthes, *L'Empire des signes,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2, Seuil, 1995, p. 794.

^⑮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0页。

^⑯ 同上书,第130页。

^⑰ 同上书,第140页。

^⑱ 瓦尔特·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载《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16页。